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七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二期 ——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4e）

---

【研究报告】	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调查	李业兴
【口述历史】	管惟炎回忆录（文革部分，下）	李雅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研究报告】

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调查

• 李业兴 •

◇ 引言

海内外对文革的历史事件及其原因的研究，尽管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不同的制约因素，但人们通过极大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少。最近出版的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录》，以及一些文革亲历者的传记则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关于当代人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的系统调查研究，就我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还未见到。估计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是有也是极其少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必要与有意义。

本研究不是对文革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在本研究中是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的研究。换句话说，它不是对灾难本身的研究，而是对人们对灾难态度的研究；它不是对历史真实的探索，而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心态记录。这样，本研究把历史与当代人的态度联系起来了，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了。这有助于深化对文革事件本身（及其原因）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国情与国民性的认识。

本研究利用发送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发送时间为2006年5月），调查对象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选取，发送与回收问卷共300，有效问卷297份。抽样方法是首先（主观地）确

定配额：中山大学东校区（广州大学城校区）本科生100人，南校区（广州）本科生100人，硕士生与博士生（都在南校区）各50人。然后用整群抽样方法，在上述各类对象中抽出其宿舍，对抽中的宿舍内的所有同学作调查。抽宿舍的方法是用等距抽样的方法。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包括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了解”部分包括：了解程度、了解途径、了解的兴趣强度、主动性以及了解的动机等；“评价”部分主要包括：对文革历史作用、必要性的评价，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及其在文革中的责任与动机的评价，对文革的研究与了解、反思的必要性评价等。此外，还有一重要内容是对大学生“民主意识”的测量，引进这一内容既是考虑到“民主意识”是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政治素质或者政治心理，也是想探究大学生对文革评价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的一个初步假设是：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其民主意识有关。本研究在最后将对这些假设作初步的统计检验。

统计中使用 SPSS 统计软件，统计数据中的百分比已经按四舍五入简化。回收有效问卷 297 份，样本基本情况是：男生 183 人（占 62%），女生 113 人（占 38%）；本科生 198 人（占 67%），硕士生 37 人（占 13%），博士生 61 人（占 21%）（注：按抽样方案，硕士生与博士生是各占 50 人的，但数据录入后，却发现统计数据与配额不符。发放问卷过程是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组由不同的调查者发送的，数据录入过程中是严格控制与检查了的。这样，这个错误很有可能是因为硕士生与博士生宿舍较为混杂，问卷发放过程工作不够细致造成的。但这个错误对本项研究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家庭经济状况按贫富程度分为“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人数分别为 13（占 4%）、146（占 49%）、127（占 43%）、9（占 3%）；出生地（注：问卷中用“出生地”可能不够准确测量生源情况，因为“出生地”与“居住地”有可能有所不同）分为农村与城镇，人数分别为 135 人（占 46%）、161（占 54%）（注：在中山大学样本状况的分布，与其他高校肯定会有较大不同）。

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抽样只限于一间学校，其次抽样过程并没有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大学生样本中有硕士生与博士生的配额，并不只是本科生。

一、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

1、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的自我评定

（1）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程度的自我评定时，大部分学生（73%）选择回答是“了解一些”；而回答“了解较多”的只有 19%，回答“基本不了解与”完全不了解“的共占 8%。交互分类发现，这个问题与文化程度有所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对文革的了解就可能越多（数据略）。

（2）大学生对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名词的了解的自我评定中，选择“很了解”、“比较了解”、“了解一点”的百分比之和还较高，但还是有相当部分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表一是对有关事件、名词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的百分比（注：如果说这个变量的前面几个取值具主观性的话，最后这个取值是具有客观性的）。

表一、对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名词的了解的自我评定中，选择“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的百分比

事件或名词	完全不了解的百分比
黑五类	37

牛鬼蛇神	1 7
四类分子	4 4
红卫兵大串联	1 3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8
知青上山下乡	5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2 6
破四旧	2 6
牛棚	2 5
坐土飞机	5 4
戴高帽	2 2
忆苦思甜	3 0

(样本总数: 2 9 7)

## 2、大学生对文革了解的若干客观测量

(1) 有不少被调查者(20%)回答“不知道”“文革始于哪一年”,而在回答“知道”者中,有22%没有具体填出是哪一年,有7%填错了年份(本调查以1966年为标准答案)。不知道文革始于何年并不等于对文革了解不深,但这指标还是可作为对文革了解的一个参考。

(2) 大学生是否知道在文革时期其父母的家庭成员有否受到冲击(问卷中对“冲击”的界定是“如批斗、抄家、迫害、诬陷等”) ? 统计结果是,对父亲当时的家庭:“不知道”(18%),“知道没有受到冲击”(54%),“知道有受到冲击”(27%);对母亲当时的家庭:“不知道”(21%),“知道没有受到冲击”(60%),“知道有受到冲击”(18%)。这个测量使我们看到大学生对文革时期其父母的家庭成员的状况不知情的百分比还不少(五分之一左右),虽然这不能完全反映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不了解家庭历史不等于不了解全国历史),但其应该是对文革了解程度的一个指标;此外,这个测量使我们看到,当时受到冲击的家庭的百分比相当高。这是通过后代来了解其前辈的经历,而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大学内做调查,不一定准确(特别是对“冲击”一词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准确地反映更大范围的情况,但也可供参考,以作为反映文革波及面的参考数据。

## 3、大学生对文革事件的关注度以及了解的主动性、兴趣与动机

(1) 今年(2006年)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或者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绝大部分被调查者(69%) 在填问卷前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有14%回答“在填问卷前就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客观指标,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并没有特别的关注。

(2) 关于文革的知识是主动还是被动获得,大部分被调查者(60%)选择回答“主动了解与被动接受相结合而获得”。回答“主动了解获得”10%,回答“被动接受而获得”有28%。

(3) 对于了解“文革”的兴趣,较多的被调查者(46%)选择回答“有一些兴趣”。回答“有很大兴趣”与“有较大兴趣”共占42%、“没有兴趣”占13%。而在选择前述四个选项中的前三个选项者中,回答其了解文革的动机时,大部分(61%)选择回答“主要是对自己民族的过去或者命运的关注等”,选择“主要是好奇”的有15%。

## 4、大学生了解文革的信息途径

(1) 在各种信息渠道中,大学生对文革了解的途径,按照选择(多项选择)的百分比高低排列,依次是:书籍(62%)、家庭(48%)、影视(38%)、老师(37%)、网络(31%)、报刊杂志(29%)、同学或同辈朋友(19%)、其他(3%)。从这些数据可看到,“书籍”与“家庭”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最重要途径,相对而言,“教师”这一途径只排在第四。

(2) 平时与被调查者谈论文革较多的人(注:谈论多并不等于获得的信息多,所以这个问题也许可转换些角度问),按照选择(多项选择)的百分比高低排列,依次是:“爸爸或妈妈或其同辈亲人”(43%)、“同学或同辈朋友”(34%)、“某位或某些老师”(34%)、“爷爷或奶奶或其同辈亲人”(21%)、“没有人与我谈论”(11%)。可见,家庭与同学朋友成为大学生谈论文革的主要场景。

(3) 在家庭中,父亲与被调查者谈论文革的频度,选择回答的统计结果是:“经常”(5%)、“偶尔”(65%)、“从不”(28%)。对于被调查者的母亲,相应的统计数据是:“经常”(4%)、“偶尔”(48%)、“从不”(44%)。可见,父亲比母亲谈论文革的频度更高些,这是可意料到的。另外,我们还可注意到,父母(特别是母亲)从未与其子女谈论文革的百分比还是比较高的。

此外,对于前述回答“经常”或者“偶尔”的被调查者,调查中还测量了其所知道的其父亲或者母亲在谈论文革时的态度。统计结果是:父亲谈论文革时的态度(及其百分比):基本肯定文革(2%),肯定与否定各半(15%),基本否定文革(61%),不清楚或难以回答(22%);母亲谈论文革时的态度(及其百分比):基本肯定文革(3%),肯定与否定各半(17%),基本否定文革(53%),不清楚或难以回答(26%)。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学生的父母在与其谈论文革时,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父母百分比并不算高。此外,即使是父母曾经与其谈论过文革的被调查者,当中还不少对其父母对文革的态度“不清楚或难以回答”,这样的谈论极有可能是深刻的或者不具体的。

## 5、大学生对了解文革信息的难度的主观评估

大学生对了解文革信息的难度作主观评估时,较多的人(43%)回答选择是“较困难”,回答选择“较容易”的也不少(31%)。其余的回答选择(及百分比)是:“很容易”(5%)、“很困难”(7%)、“不清楚或者难以回答”(11%)。

总的看来,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认为自己“了解一些”与“了解较多”的占大部分,但什么是“一些”、什么是“较多”难以明确界定,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对文革中一些著名的事件、名词,有相当部分被调查者是“完全不了解或者没听说过的”;而且,有超过五分之一人不知道文革始于哪一年。所以,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还是相当局限的。此外,对于今年(2006年)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极少,绝大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个数据既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对文革的态度与气氛,也可反映大学生个体对文革这个事件的关注度(当然,社会气氛与个人态度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有绝大部分人声称自己对文革“有一些兴趣”或者“有很大兴趣”、“有较大兴趣”,但有不少人(近30%)认为自己关于文革的知识是被动获得的。这可能表明,大学生对了解文革虽然有一定的兴趣,但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下,并不鼓励学生更多的了解,学生在升学、学习等方面的压力下,也没多少时间去专门了解,所以不少人只能在一定的场合中“被动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大学生谈论对文革了解的有关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高中时曾问老师关于文革历史问题,许多老师以“这种敏感问题考试不会涉及”拒绝回答学生的问題;到大学后,在学习、就业压力下,学生不得不多关注“实用知识”,而无暇顾及关注文革历史。前述的统计结论也表明,在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途径中,“书籍”与“家庭”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最重要途径,相对而言,“教师”这一途径只排在第四。看来,

学校（课堂或者教师）并非学生了解文革的主途经。另外，虽然家庭（父母）是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重要途径，但即使其父母曾经与其谈论过文革，有不少大学生对其父母对文革的态度都不清楚或者不明确，家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对于获得有关文革的信息的难度，认为困难者比认为容易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获得文革资料的困境。当然，对难度的理解是有相当强的主观性的，如果只局限于了解表面的信息，可能会觉得容易；如果了解深层的真实的信息，则可能会觉得困难，这是一个与个人对信息质量的要求有关的主观感受。

二、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

1、文革给大学生们的印象

为测量文革给大学生的印象，问卷中列举了一些对文革的描述供被调查者选择，被调查者的选择按百分比高低排列是：荒唐（75%）、恐怖（49%）、其他（14%）、自由或民主（3%）、好玩或刺激（2%）。

除了前述用个别词语描述文革之外，我们还尝试汇集较为流行的对文革的语句描述或评价，看大学生对这些描述评价的认同程度。表二是具体数据。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对文革负面评价的描述能得到较多的人的认同，而对文革的某些方面的肯定评价（如穷人地位高，思想境界高等）还是能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表二、大学生对文革的若干描述的认同程度（百分比）

	非常同意或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或很不同意
1. 文革对中国是一场灾难	90	6	3
2. 文革惩治了贪官污吏，对社会有好处	14	43	42
3. 文革时期的人们思想境界高比现在高	19	18	62
4. 文革时期穷人的社会地位高	37	28	35
5. 文革中的斗争十分野蛮、残忍与可怕	86	9	4
6. 文革打破秩序让平民参与政治， 是民主的表现	8	16	74
7. 文革中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61	26	12
8. 文革时期社会比现在平等公正	10	21	67

（样本总数：297）

交互分类发现，大学生对文革的印象与其父亲的家庭文革时期的遭遇有关，比如，对“文革对中国是一场灾难”的“非常同意”或者“同意”的百分比，其父亲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其父亲家庭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更高（分别是96%与88%）。但把前述“其父亲家庭遭遇”改为“其母亲家庭遭遇”，则得到相反的结论：其母亲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其母亲家庭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者的这个百分比略低（分别是87%与91%）。这个结论是出乎意料，看来难以解释。整个调查问卷发放与录入过程都有较为严格的控制，调查过程的错误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文化是强调内外有别、亲疏有别的，是不是中国人对自己家庭（家族）的苦难的感受才较为强烈，对这之外的家族（即使是自己母亲的原来所属家族——其成员在中国文化中的亲戚称谓已经用“表”字来称呼）的苦难感受远没有那么强烈？这只是一猜测。

2、大学生对文革给我国的影响的评价

大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影响或作用的评价，回答选择肯定性评价的极少——回

答选择“基本上是正面作用”仅占1%，“利大于弊”占2%；基本上是倾向于选择否定性的评价，回答选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占60%，但有不少被调查者对文革并不是这样彻底的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否定——回答选择“弊大于利”占29%。交互分类发现，对文革影响的评价与被调查者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关较为明显，家庭经济状况按贫富程度分为“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各类人认为文革“利大于弊”的百分比分别为8%，1%，2%与0%（呈递减趋势）；各类人认为文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的百分比分别为39%，53%，69%，67%（呈递增趋势）。但是，交互分类得出，大学生的文革评价与其父亲对文革的评价有一定的相关但不明显；大学生的文革评价与其父亲或母亲家庭在文革时期是否受到冲击没有明显相关（这结论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 3、大学生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看法

大学生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看法中，回答选择“没必要”的最多（47%），但百分比不算高；其余的，除了较多人（27%）选择回答“没想过或者不知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有一点必要”（19%）以及少数人选择“有必要”（5%）。

与上述第2点类似，交互分类发现，对发动文革必要性的看法与被调查者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关较为明显，而与调查者父母家庭当时在文革中是否受到冲击相关不明显（数据略）。

### 4、大学生对“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的看法

大学生对“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回答“毛泽东”的与选择回答“难以追究责任者，大家都有责任”这两项的人数一样（都是43%）——尽管问卷设计中这一问题为复选题，但交互分类发现，同时选择回答这两者的极少，所以可以认为选择这两者的人们是不同的，而人数一样——选择回答“林彪或四人帮”者不多（25%）。这一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按照官方的宣传并不是这样宣传的。

### 5、大学生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看法

在上一问题——“谁应该对文革负最主要责任”中，对于回答选择了“毛泽东”的被调查者（总人数为127），问卷中还进一步问了一个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问题，选择回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选择回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别人利用了”的人数基本一样，前者比后者略多（分别为44%与37%）。看来，人们对动机的理解有较大的不一致。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是针对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负有责任的被调查者的，如果考虑其他的被调查者，估计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别人利用了”的百分比会更高。

### 6、大学生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

关于大学生对毛泽东的评价，选择回答“功大于过”的最多（47%），其次是选择回答“难以评说或者难以通过功过比例评说”（33%），再次是选择回答“功过相抵”（12%），选择回答“功小于过的”的最少（6%）。去掉前述百分比排列第二的选项以及选择了该选项的人数，在剩下的三个选项及剩下的人数中重新计算百分比，认为“功大于过”、“功过相抵”、“功小于过”的百分比分别是：71%，18%，10%。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部分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而认为毛“功小于过”的相当少。

总的来说，大学生对文革的印象与评价，多数人或者大多数人是倾向于负面的，但也有些

正面的评价能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而且不少大学生对文革的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否定。相应地，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认为文革在当时有必要。

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以及对当时文革的必要性的看法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关。至于文革的责任，大学生们较多人认为“毛泽东负最主要责任”以及“大家都有责任”，把主要责任归于林彪或者四人帮的不多。大部分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正面与从反面理解的人数看来大致相当。

三、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及其与对文革评价、对毛泽东评价的关系分析

本文在前言曾指出，为解释大学生对文革与对毛泽东的评价，本研究提出的一个假设，假设其与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有关。这样本研究通过量表测量了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并对若干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分析。

1、大学生的民主意识量表测量及其结果

民主意识测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总加量表）形式测量，选择的指标（或测量项目）共10项，表三是量表具体内容以及被调查者选择回答的百分比情况。

表三：民主意识量表各具体项目及被调查者选择回答情况的百分比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1，对儒家文化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14	57	2	6	22
2，西方式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起决定作用	3	37	15	37	63
3，是否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是区别真假民主的一个标志	10	41	22	23	24
4，为了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是合理的	3	39	13	36	75
5，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显得较公平有序	12	54	17	15	16
6，新闻自由利大于弊	24	54	10	11	17
7，只要经济发展，民主缓后也可以	2	14	15	52	168
8，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	5	39	18	28	79
9，国家有一个好领导人比有一个合理制度更重要	2	11	12	28	18
10，中国目前国民素质还不适合实践民主	5	25	15	44	9

民主意识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的含义为参考，测量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上表中的指标1、2、3、4、5、6、8、9，用以测量对平等观、对人性的理解、对现实社会中的宪政民主、对政治反对派、对保护少数派、对新闻自由、对民众的素质、对掌握权力者的制度制等方面的态度；二是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的程度，主要体现在上述的指标7，用以测量民主在被调查者心目中的地位。量表中的测量项目分为正向（项目3、5、6）与负向（项目1、2、4、7、8、9、10）。正向意味着对其越是同意，民主意识就越高，测量得分就越高，按“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的同意程度，评分依次为5、4、3、2、1；而负向则相反，按“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的同意程度，评分依次为1、2、3、4、5。量表满分是50分，

调查统计得出，被调查者的得分的平均分是 32.3（标准差：6.2）。如果量表是有效的，这分数表明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不算高，也不算太低。量表中各指标与总分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大致在 0.4 与 0.7 之间，这表明量表有一定的一致性程度（即信度），但量表能否准确地测量出人们的民主意识（即效度）却难以判断。

量表总分把被调查者对每个项目的态度掩盖了。如果我们考察被调查者对量表中的每个项目的态度，就可发现有些数据值得关注。“对儒家文化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的认同率（指“非常同意”与“同意”的百分比之和，下同）共为 71%，说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传统的重要内容）的认同度较高；对“西方式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起决定作用”的认同率与不认同率（指“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的百分比之和，下同）基本一样（前者为 40%，后者为 43%），对“是否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是区别真假民主的一个标志”的认同率虽然较高（共为 51%），但不认同率也不低（共为 25%），这说明大学生对西方式的选举（或者竞争性选举）以及社会宽容的态度差异较大，评价总体看来并不高；对“为了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是合理的”的认同率与不认同率基本一样（前者为 42%，后者为 43%），说明大学生对如何保障少数派，特别是个体的利益方面态度差异较大，相当多人没认识到保护少数派或者个体权益对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对“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的认同率（44%）远高于不认同率（35%）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倾向于人性善的假设或者对权力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对统治者的动机的理解还较为“天真”；对“只要经济发展，民主缓后也可以”的不认同率虽然较高（68%），但也有不少是认同的（认同率为 16%）以及回答选择“无所谓”的（15%），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人（前述两数据之和为 31%）在现阶段对民主没有特别的向往与追求。

## 2、大学生的民主意识与对文革评价、对毛泽东评价的相关分析

（1）大学生对文革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与民主意识相关不明显。大学生对文革历史作用的评价在本调查中是定序变量，其取值按顺序“基本上是正面作用”、“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基本上是负面作用”分别赋值为 1、2、3、4；尽管其是定序变量，我们在统计中也算出其与民主意识总分间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为 0.2（显著性水平 0.01）。看来两者相关并不显著，原来的假设没被证实。

此外，除了相关系数分析，在统计中还对方量表中的若干指标与上述对文革的评价进行交互（列联表）分析，也没发现其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2）、大学生对毛泽东评价与民主意识相关不明显，而与民主意识量表中若干指标的相关较为明显。问卷中测量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的选择项有四个：功大于过，功过相抵，功小于过，难以评说或者难以通过功过比例评说（注，这里的答案选项还不够完整，如果增加“只有功没有过”以及“没有功只有过”两个选项，可能会更合理些）。在统计中分别算出这四个选项的选择者的民主意识得分的平均分，其分别为：31.2，34.8，34.8，33.4。这四个平均分间相差不大，这样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其民主意识高低的相关并不明显。研究假设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当我们把民主意识量表中若干具体指标与对毛泽东评价进行交互分析时，却发现存在有较明显的相关。比如，表四是量表中的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显得较公平有序”的同意度与对毛泽东评价的交互分类表。我们从表中的百分比比较可发现，对欧美民主的认同程度越高，对毛泽东评价就可能越低，两者呈负相关。类似地，我们对量表中的对“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的同意度与对毛泽东的评价作交互分类，也可发现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统计表格略）：对领导人动机的理解越是“善良”，其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可



能越高，两者呈正相关。

表四、对欧美民主的认同度与对毛泽东功过评价之关系

欧美民主的公平性	对毛评价				合计
	功大于过	功过相抵	功小于过	难以评说	
很不同意	2	0	0	0	2
不同意	2 8	1	2	1 4	4 5
无所谓	2 0	8	1	1 8	4 7
同意	7 6	2 2	1 0	5 1	1 5 9
非常同意	1 2	4	6	1 3	3 5

总的来说，大学生的民主意识看来不高，对西方式的竞争性的、容忍反对派存在的、注重对少数派的权益（包括个人权益）保障的民主机制认同度并不高，对领导人的权力（以及政府权力）及其动机的警惕性并不高，不少人对民主的追求也不在乎。如果说，这些因素对文革的历史作用的评价相关不大的话，它们或多或少与对毛泽东评价有关。看来，对文革的评价的至少在表面上是相当有共识度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其共识度也低得多。

#### 四、大学生对文革与现实相关问题的看法

##### 1、大学生对研究、了解、反思文革的态度

（1）8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术或思想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研究“很必要”或者“必要”。

（2）86%的被调查者认为普通中国人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或者“有必要”。

（3）80%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很有必要”或者“有必要”。

（4）65%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中开设文化大革命选修课“很有必要”或者“有必要”；而对这问题回答选择“无所谓”或“没必要”的也不少（分别为19%与15%）。

（5）79%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开设的有关课程中对文革历史的介绍“不够”；认为“足够”或者“基本足够”的共有12%。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许能理解，在前述介绍大学生了解文革的途经时，通过“教师”这一途经了解文革的百分比并不高（排在第四位）。

（6）对于文革是否需要“忏悔”（注：问卷中是用了“忏悔”一词，可能用“反思”一词会更好些），这个问题的回答选择相当分散，各种选项的百分比相差不大，依百分比从高至低排列为：31%选择“当前全民族的每个成员均应该作出忏悔”，23%选择“没想过或难以回答”，18%选择“在文革中的每个经历者（包括参与者、受害者等）均应作出忏悔”，15%选择“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人应作出忏悔，其他人没必要忏悔”，13%选择“没必要忏悔，要向前看”。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大学生对苦难的忏悔意识并不强或者并不普遍。

##### 2、大学生对与文革有关的现实问题的看法

（1）对于“目前中国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个问题，75%选择回答“没必要”，而选择回答“有必要”与“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2%与8%。剩下的13%选择回答“没想过或不知道”。

通过交互分类可知,这一问题与被调查者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有较明显的相关。家庭经济状况分为“贫困或者未达温饱水平”、“温饱水平”、“温饱有余或小康”、“较富裕或者富裕”,各类人对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5%,13%,7%,0%。这一问题(变量)与被调查者的出生地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也有明显相关,这两类人对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5%与6%。这些数据都体现了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态度。这一问题(变量)与被调查者的性别也有明显相关,男性与女性对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3%与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一问题(变量)与学历(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的交互分析发现,其与学历相关不明显。

(2)对于“如果目前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被调查者的态度大多是“坚决抵制”(56%)与“消极对待”(26%),回答选择“积极参与”者不多(4%)。

交互分类发现,这一问题与性别关系值得注意,选择回答“积极参与”的男性比女性多(分别为7%与1%);这一问题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关系、与出生地的关系也与前述第7点中的结论类似(具体数据略),体现了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态度。

(3)对于“类似文革的运动在中国未来是否会重现”问题,选择回答“一般不会”的较多(47%),选择回答“可能会”的也不少(21%);而选择回答“绝对不会”的不多(10%)。这些数据反映出,大学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预测一致性并不高。

(4)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是否还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典型做法”这一问题,大部分选择回答“不知道”(54%),而选择回答“有”的比回答“没有”的更多(前者为27%,后者为18%)。这些数据体现了,相当多的大学生对现实或者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没有明确感受(或者没作深的思考),而历史(文革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人们感受到现实中存在着类似文革的做法)。问卷是要求对这一问题回答选择“有”者要具体列出具体事件或者做法的,但问卷中的这个填空基本上是空白,感受到“有”却是欲说还休,这其中的原因难以猜测。

总的来说,大学生绝大部分都认为学术界研究文革、普通中国人了解文革有必要,认为高校开设的有关课程对文革介绍不够,而认为对文革“当前全民族的每个成员均应该作出忏悔”的百分比并不多,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忏悔意识并不强——当然,这是与整个社会气氛密切相关的,整个社会没有正视苦难的反省的气氛,经历过文革者甚至曾经作恶者都没有反省,大学生们的反省意识自然不可能强。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的再来认为没必要,即使再来也是“坚决抵制”或“消极对待”。这种态度与人们的目前经济有关,经济状况影响着人们对文革再来的必要性以及对其参与的态度。虽然大部分大学生对文革认为“一般不会”或“绝对不会”,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文革可能重现,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还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典型做法”。

本文最后对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对文革的评价、对文革与现实相关问题的看法之间的关系作些综合考察。交互分类发现,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的主观评价与其对文革的评价没有明显相关。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与其对目前文革再来的必要性的态度有关,对文革评价越高,其越有可能认为文革再来有必要。大学生对文革的评价与其对目前中国是否类似文革的做法的感知也有明显相关,对文革评价越高,认为“目前有类似文革的做法”的百分比就越低(数据略)。

本文的特色之处在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调查的内容设计、对变量间关系的分析较为全面与深入。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前言中已经指出,希望本文能够为学术

界进一步探讨人们对文革的心态提供参考。

◇ 附：调查问卷

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调查问卷

同学：

你好，我们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法课程实践需要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大学生对文革的了解与评价。根据我们的抽样方案，需要占用你的一些时间（约十五分钟），填写该份问卷，恳请你在忙碌中抽出时间给予我们帮助。问卷答案无所谓对错，我们只希望了解你的真实想法。问卷只用于统计，我们将对你的答案保密，请放心回答。谢谢！

填问卷说明：除非特别说明，问卷中的问题答案均为单选。请你在适合你的答案的编号上打“√”。有些题目需要填空的，请在空格上填写。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研究法课程学习班 2006.05

说明：本调查的对象范围是中山大学东校区与南校区在校生，不在此范围内者请不要填答问卷。

一、

1、你认为你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程度是

1.了解较多 2.了解一些 3.基本不了解 4.完全不了解

2、你第一次接触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的时间是

1.小学以前 2.小学阶段 3.中学阶段或以后

3、你第一次接触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的场合或者途径是

1.在与家人的谈话中 2.在听老师的讲话时 3.其他（请注明：）

4、你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途径是（可多选）

1.报刊杂志 2.书籍 3.影视 4.网络 5.家庭（前辈或者同辈） 6.老师 7.同学或同辈朋友 8.其他（请注明：）

5、与你谈论“文化大革命”较多的人士有（可多选）

1.没有 2.爷爷或奶奶或其同辈亲人 3.爸爸或妈妈或其同辈亲人 4.哥哥或姐姐 5.某位或某些老师 6.同学或同辈朋友 7.其他（请注明：）

6、你的父亲与你谈论过“文化大革命”吗？

1.经常 2.偶尔 3.从不（若选该选项，请不必回答下一题——即第7题）

7、（上题回答选择答案1、2者请回答本题）其与你谈论文革时的态度是

1.基本肯定文革 2.肯定与否定各半 3.基本否定文革 4.不清楚或难以回答

8、你的母亲与你谈论过“文化大革命”吗？

1.经常 2.偶尔 3.从不（若选该选项，请不必回答下一题——即第9题）

9、(上题回答选择答案 1、2 者请回答本题) 其与你谈论文革时的态度是

1.基本肯定文革 2.肯定与否定各半 3.基本否定文革 4.不清楚或难以回答

10、据你所知，在文革中，你父亲当时的家庭（含全部家庭成员）有否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如批斗、抄家、迫害、诬陷等）？

1.不知道 2.没有 3.有，受到的冲击的具体形式是：

11、据你所知，在文革中，你母亲当时的家庭（含全部家庭成员）有否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如批斗、抄家、迫害、诬陷等）？

1.不知道 2.没有 3.有，受到的冲击的具体形式是：

12、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于哪一年吗？

1.不知道 2.知道，是 年

13、你意识到（注意：是“意识到”，而不是“知道”或者“能自己计算出来”）今年是文革结束 30 周年吗？

1.填这问卷前就意识到了 2.填这问卷时（包括答到上一题时）才意识到的 3.其他

14、你对文革的知识主要是通过

1.主动了解获得 2.主动了解与被动接受相结合而获得 3.被动接受而获得 4.其他（请注明：）

15、你有没有了解“文革”的兴趣？

1.有很大兴趣 2.有较大兴趣 3.有一些兴趣 4.没有兴趣（跳过下一题）

16、(上题中选答 1、2、3 者请回答) 你说你有（一些）兴趣了解文革，你的动机是：

1.主要是对自己民族的过去或者命运的关注等 2.主要是好奇 3.其他（请注明：）

17、你觉得目前获得有关文革历史的信息容易吗？

1.很容易 2.较容易 3.较困难 4.很困难 5.不清楚或难以回答

18、你了解“文革”中的下列名词或事件或现象吗？（请在每一行适当的位置打钩）

很了解 较了解 了解一点 完全不了解或没听说过

“黑五类”

“牛鬼蛇神”

“四类分子”

红卫兵大串联

“九、一三事件”

“天安门事件”

“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知青上山下乡”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破四旧”

“牛棚”

“坐土飞机”

“戴高帽”

“忆苦思甜”

二、

19、“文化大革命”给你的印象（就你现在所掌握的有关信息）是（可多选）

1.无印象 2.恐怖 3.好玩或刺激 4.荒唐 5.自由或民主 6.其它（请注明）

20、你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影响或作用

1.基本上是正面作用 2.利大于弊 3.弊大于利 4.基本上是负面作用 5.没想过或不知道

21、（请上题中选择答案3与4者回答）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你认为谁应该负最主要责任？（可多选）

1.毛泽东 2.林彪或“四人帮” 3.难以追究谁是主要责任者，大家都有责任 4.不知道

22、（请上题选择答案中包含1者回答）如果你认为毛泽东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你对其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的看法是：

1.不知道或没思考过 2.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被别人利用了。 4.其它（请注明：）

23、你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1.功大于过 2.功过相抵 3.功小于过 4.难以评说或者难以通过功过比例评说

24、在你的印象中，你所接触到的经历过文革的前辈（目前约40岁以上者）当中，他们对文革态度

1.没印象或者不清楚 2.持肯定态度的占多数 3.持肯定与否定态度者约各占一半 4.持否定态度者占多数

25、在你印象中，你所接触到的同辈人（20岁左右到30岁左右）中，他们对文革态度：

1.没印象或者不清楚 2.持肯定态度的占多数 3.持肯定与否定态度者约各占一半 4.持否定态度者占多数

26、请对下列看法发表你的意见：（请在每一行适当的位置打钩）

非常同意 / 同意 / 不清楚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1.文革对中国是一场灾难

2.文革惩治了贪官污吏，对社会有好处

3.文革时期的人们思想境界高比现在高

4.文革时期穷人的社会地位高

5.文革中的斗争十分野蛮、残忍与可怕

6.文革打破秩序让平民参与政治，是民主的表现

7.文革中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8.文革时期社会比现在平等公正

27、你认为，学术或思想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研究是否有必要？

1.很必要 2.必要 3.无所谓或不清楚 4.没必要

28、你认为普通中国人是否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1.很必要 2.必要 3.无所谓或不清楚 4.没必要

29、你觉得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吗？

1.很必要 2.必要 3.无所谓或不清楚 4.没必要

30、你认为，在高校中开设“文化大革命”选修课

1.很必要 2.必要 3.无所谓或不清楚 4.没必要

31、你觉得，高校开设的有关课程中对文革历史的介绍足够吗？

1.足够了 2.基本足够 3.不够 4.没想过或不清楚

32、你认为，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作出忏悔（在这里，“忏悔”是指剖析自己行为方面或内心方面的人性上的负面因素）？

1.没必要，不要拘泥于过去，应向前看。

2.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人应作出忏悔，其他人没必要忏悔。

3.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个经历者（包括参与者、受害者等）均应作出忏悔。

4.当前全民族的每个成员（不管是否经历过文革）均应该作出忏悔。

5.没想过或难以回答。

33、你认为在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

1.有必要 2.有一点必要 3.没想过或不知道 4.没必要

34、你认为目前中国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1.有必要 2.有一点必要 3.没想过或不知道 4.没必要

35、如果目前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你的态度是：

1.积极参与 2.消极对待 3.坚决抵制 4.其它（请注明：）

36、按你的理解或分析，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中国未来是否会重现？

1.一定会 2.可能会 3.不知道或没想过 4.一般不会 5.绝对不会

37、你觉得目前中国社会还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典型做法吗？

1.不知道 2.没有 3.有（请具体指出：）

38、你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籍或文章主要有（请列出书名或文章名，文章请注明报刊名）：

39、请你就你本人所了解的信息，具体谈谈你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印象或评价：

40、请对下列看法发表你的意见：（请在每一行适当的位置打钩）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无所谓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a 对儒家文化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b 西方式的选举实际上是金钱起决定作用

c 是否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是区别真假民主的一个标志

d 为了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益是合理的

e 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显得较公平有序

- f 新闻自由利大于弊
- g 只要经济发展，民主缓后也可以
- h 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幸福的，效果不好是方法问题
- i 国家有一个好领导人比有一个合理制度更重要
- j 中国目前国民素质还不适合实践民主

三、

4 1、你的性别是

- 1.男 2.女

4 2、你是

- 1.本科生 2.硕士研究生 3.博士生

4 3、你在读

- 1.一年级 2.二年级 3.三年级 4.四年级

4 4、你就读的专业属

- 1.人文科学 2.社会科学 3.理、工、农、医科 4.其它（请注明：）

4 5、你的家庭经济情况

- 1.贫困或未达温饱水平 2.温饱水平 3.温饱有余或小康 4.较富裕或富裕

4 6、你的政治面目是

- 1.中共党员或者中共预备党员 2.共青团员 3.民主党派人士 4.无党派人士

4 7、你出生地属

- 1.农村 2.城镇

（问卷至此结束，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 原载“中国乡村网”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

## 【口述历史】

管惟炎回忆录（文革部分，下）

• 李雅明 •

在芝加哥的加速器理论研究室，专门研究加速器理论的人是一个华人叫邓昌黎，那时我们代表团不能接见邓，因为邓被蒋介石接见过，而且在台湾被认为是模范工程师，蒋介石给了他这个称号，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亲台湾的。但是整个接待工作当中，美方当然安排了有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单独跟他会谈。当时确实有些人要求单独跟我们代表团见面，美方一般都是制止的，怕出意外事故。当我们到旅馆时，我们的保镖在我们前面先下车，在旅馆大门口排成两行，把人行道的人挡住，让我们过去，以免在这过程中出了差错。当时有些美国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发生争执。我们巴士的前后都有警车，感觉很威武，但是行动被限制，当时我们也不敢自由行动，使馆方面也不准随便上街乱窜。我们的旅馆一般都是比较高级的饭店，每天我们的

招待费好像是三百美金。除了国际旅费是我们自己出的，进了美国就完全由美方招待。

从芝加哥再到旧金山，就是 SLAC，那时看到一个斯拉夫人叫柏金斯基（编注：可能是指 W. K. H. Panofsky，1919—，在1961—1984年间担任 SLAC 主任），这个人就是 SLAC 的头，这个直线加速器的长度是两公里，2.2 GeV 的能量，当时计划要用微波超导腔来改进，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当时有这个意图，用在直线加速器上，用超导体作微波的腔。还参观了附近工厂及斯坦福大学的材料中心，在旧金山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

最后一站是 Los Alamos，是做原子弹实验的地方，我们提出参观的理由是，那里面也有一个直线加速器，斯坦福那个是电子的，这边是一个质子的，能量只有800 MeV，就是能量比较低，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的目的是产生中子，所以也叫中子工厂。是在新墨西哥州，从 Albuquerque 改乘巴士，盘着山道进去，那里等于一个小的科学城，周围都是为这个研究所服务，相当于中国的三线省，就是在很隐秘的地方，第一个原子装置就是在那里爆炸的。市长是一个女的，有一天早上接见我们，就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礼物，是一个亚克力里头嵌着第一次核爆以后融化的岩石小块。当时我们为了这件事讨论了一个晚上，要不要接受这礼物，因为原子弹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讲也是有好处，但是这是美帝的原子弹，接受了可能有问题。中国有一个科学代表团到日本去访问，日本科学家就送给每人一个蜗牛（编注：玻璃制品），回国以后，江青发现了，就把这个代表团的人去批得一塌糊涂，说他们是受了人家的污辱，蜗牛动作很慢，就便是在讽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进步很慢，你们居然还把它收下来。总之你在接受外国人东西时，像原来那个国务院的原子笔我们就不敢要，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外事局的人，跟黄华联系，黄华当时在华盛顿。拒绝人家这东西，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不拒绝又怕回去以后出问题。最后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决定还是收下，但是回去以后不要讲，这东西现还保存在我家。

最后回到华盛顿，美国科学院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招待会。会上有不少当时在美国有点亲大陆的学者，那时亲大陆的还不是很多，一部分是参加保钓运动当中，比较亲左的。在华盛顿见了黄华，然后从纽约经过大西洋到日内瓦，十二个西方国家合资建了一个核子研究所，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苏联郊区杜布纳，也建立了一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因为高能加速器的投资很大，需要许多国家来合作。这个加速器也是在地下，在日内瓦，有一部分在法国境内，所以在法国那边也有分部，我记得为了要参观另一半，还要通过海关，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李政道，还有丁肇中，当时他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很年轻。我们内部曾判断，杨振宁是没问题，因为他已经到大陆访问过了，但是对李政道就心存疑虑。后来李政道还特地赶回来见我们，丁肇中当时就在日内瓦做实验，还有袁家骝。袁家骝、丁肇中、吴健雄、邓昌黎、李远哲，这五个人是推荐我到台湾来的，那时台湾邀请旅居海外的大陆杰出科学人士，有个规定，一定要由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推荐。袁家骝长期的工作地点是 Brookhaven，当时他到欧洲作访问学者，他跟我们接触比较多，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关心。在日内瓦访问完以后，他们招待我们到伯尔尼、苏黎世，然后就回中国了。

我们原本担心会出什么政治性的问题，后果就很严重，还好没有。七二年到欧洲，七三年到美国和日内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了共产党，终身为这个理想去奋斗，宣誓词甚至生命都可以牺牲，当然也觉得很高尚。另外却又有一种感觉，从我入党以后不久开始，觉得自己被一个东西绑住了，不能完全自由自在，所以就很羡慕自由世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国内你走哪都有人监控你，尽管像我这样的人也一样。为什么我在科技大学胆子那么大，敢支持方励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问题，是真正有一种在党内是主人翁的感觉。并不是真正有人监控，但是你就是放不开，因为那时就是每个礼拜，后来是两个礼拜或一个月，要开一次会，缴党费那倒是没什么，要换个地方就是组织调动，一般来讲都很难。另外其他所有事情，不管你走到哪，都是有不自在的感觉，当然自己也愿意为这个事情而牺牲，



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希望有比较自由的天地，属于个人完全自由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比我们要自由一些。另外物质文明的差距，当时来看是比较大的，大陆那是比较贫困，现在可能慢慢也进步了，这方面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因为即使我们没去我们也知道，普通老百姓也许不知道。我们在法国时，他们还故意让我们去看贫民窟，马克思也写资本主义的另一面无产阶级，我们一看，只觉得非常好的公寓嘛。像物理所很多人很长时间住在“鸡窝”里头，结了婚以后是石棉瓦做的房子，很矮，而且不是真正的房子，我们住得比较正规的房子，也是很小的，生活条件来讲，那时差距就很大了。

七二年总理比较权威一些，原先总理好像是边缘人物，江青、陈伯达，这些人很嚣张的，这时他们好像都有点问题了。接着就是邓小平复出，好像是在七三年。在复出以前，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现在要给你们推荐一个人，你们会很吃惊。因为刘邓路线，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头之一，最后毛泽东就说是邓小平，当然他也讲了一些好话，希望他当总参谋长，兼副总理。那时周恩来好像就开始身体不好，所以有邓小平来管一些事，另外他讲邓小平这个人是绵里藏针，又柔又刚，很有能耐。后来邓小平来参加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一九七四年我在干校时。另外美国福特总统访问中国，我们也到机场去列队欢迎了，邓小平也去了。第二次可能就是卡特了，可是那时内部已经开始批邓了，邓小平还到机场接见，那次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的样子，我们已经知道，内部都已经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要批邓，看他已经很紧张的样子。另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邓小平的报告里，同时宣传红楼梦，因为过去老旧的书都是四旧，唯独他认为红楼梦是好书，还问江苏省委书记许世友读过没有，这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好像经常毛主席讲话会常引用红楼梦的文句，他在苏联给我们讲话时说“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王熙凤讲的话，毛泽东对西方或现代的东西知道得很少，中国的古籍知道得比较多。他接见尼克松时，人民日报登他在书房接见的照片，他的书架上全是线装书，另外还有一个大痰盂，这个人基本上对西方现代的东西所知很少。我曾经称赞过他对战争的天才，打仗这方面确实很厉害。

#### ◇ 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时，江青推广样板戏，因为样板戏要拍成电影，需要用胶卷，认为这是一个大事，所以根据江青的指示，科学院在七四年左右专门成立一个“感光研究所”，现在还有这个研究所。接着在一九七四年轮到我要去干校，也是坏事也是好事。七四年是批林批孔开始，在物理所来讲，具体情况就是在批我写的提纲，好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包括我们研究组里，比我们年轻的人，当时我很积极，很支持这些东西（基础科学研究），不只提纲还写过别的东西，在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反动的。那时有年轻人就嘲笑我，说我太幼稚。我当时觉得不会，因为经过反复，还是证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还是要有比较常规的秩序，不能这样乱搞。结果还是他们说对了，我当时确实顾虑不够，比较幼稚，我就觉得总结前面的教训，应该不会再反过去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开的七千人大会，他自己都承认错误了，就应该收敛，不该再乱搞，结果还不是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比大跃进还要厉害，而且搞了十年。我们进干校以后，江青发动了批走后门，那年开始很厉害，声势很大。走后门就是说，什么事通过关说，干部子弟从农村到城市里参军参干，都是走后门。批走后门影响面很大，对各级领导冲击很大，很快被总理制止了，所以江青很恨总理。江青发动这个批走后门，当时下面老百姓非常高兴因为对象是干部，老百姓有什么走后门，他又没权没势，各级领导干部实际上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亲戚朋友或其他来关说的子女，安排到比较好的位置。这样一来，所有的干部都紧张，都涉及了。周总理为什么制止了，前面一次已经因为走资派把各级领导打下去了，这样一来，又要把新的领导打下去，很危险，后来就很快刹住了。

接下来不久就开始批林批孔，批林可以理解就是林彪，过去把他尊为副主席，现在要清毒，把孔老二（孔子）拿出来批，大家就不太了解。当时毛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公布了他给江青的一

封信，其后果，包括我这样的人，对毛泽东的印象就一落千丈。为了推卸他将林彪成副统帅的责任，心中似乎早就知道林不是好人，他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写的，内容大概是说，林彪这些人虽然拥护他，实际上是心怀鬼胎。那你既然早就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把他弄成副主席，因为一直宣传毛主席明察秋毫，什么事都看得清清楚楚。批判刘少奇很大的罪状是招降纳叛，刘少奇重用了包括薄一波、彭真这些人，当时被认为是叛徒的人，他们都是关在国民党监狱里，抗战初期才放出来，说他们在监狱里都自首了，所以是叛徒投降了，实际上是冤枉的，要说刘少奇是招降纳叛的话，毛泽东便应该是更大的招降纳叛者，因为他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来作为副主席。林彪不是也是叛乱吗？毛泽东的说法实在说不过去，你既然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要重用呢？心中还说了一些故作谦虚的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自己并不怎么样。发动参观林彪在北京毛家湾的住处，说他生活腐朽。

干校一般都设在比较落后的农村，我去的是在河南省的确山县，是在京汉铁路交通干线上，不过我们不是在确山县城，而是在确山的乡下，山沟里头的人民公社叫做香店大队。一般干校规定是一年，前半年是插队落户，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半年是集中在干校里学习，同时也劳动，并不是正规的学校，只是有几间房子，全部的人挤在大通铺。前半年真是看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比我在东北土改时还要落后，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住在那老百姓家，真的是跟牛住在一起，夜里牛反刍我们都知道，床上虫子很多，门口就是一个大粪坑，为了施肥用的，味道很重，也没有厕所，就直接背对着粪坑解决，如果不小心就会跌到粪坑里头。吃饭的话是粗粮，没有稻米、白面，只有玉米、大麦这些，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点辣椒，整个这一段生活真的是很艰苦，当然就是为了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李：是每个人都要去还是？

管：每个人轮流都要一年，我轮到是比较晚，在我前一年去的人，从一个意义上说很好，那时因为周恩来的缘故，晚上可以学习英语，学业务，还能搞一点劳动以外业务的东西，所以我去时带了一箱子的书，到了以后，才发现我这一届不行了，因为开始批林批孔，不允许看业务，当然到了后期比较轻松的时候，还是偷着可以看，我记得我看了狄拉克（编注：Paul Dirac, 1902—1984，英国物理学家，获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奖）的量子力学。贫下中农觉得我们劳动不错，临走的时候，他送我们一面锦旗，旗子上面就写“中国科学院‘无’理研究所”，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物理，就以为是有理无理的无理，真是哭笑不得。在后面半年除劳动外主要是批林批孔，我们就发现物理所正在批我写的提纲，一起去都是物理所的人，大家也知道是在批我，不过在那里倒是相当友好，没有人批我，假使我在物理所的话，可能就得上台接受批斗了，倒是没有把我揪回去批斗。当时带队下乡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后来在物理所当副所长，他还跟我比较友好，保护了我。在那里一开始是不准看书的，打扑克牌倒是没有人批判。在干校时，我们负责种西瓜，西瓜成熟时夜里还得到瓜棚去守夜，因为怕被偷。那时比起跟老乡在一起时生活就比较好了，到干校时因为自己养猪，每天杀一头猪。

郑宗爽在原子能所，比我早两三年去干校，她去的时候是跟他们说永远不回来了，所以他们也不问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在湖北省荆江，在长江上游武汉上面，比我们还要苦，下田种稻米、除草什么的，完全跟农民一样。我在大陆下放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四川参加四清，第二次是到五七干校。

李：像到这些地方，知识分子又不太会种田，怎么办？

管：就要学啊！那时有些复员军人跟我们一起下去了，他们原先就是农民出身，就很厉害，也会教你。

那时提出来“儒法斗争”，一方面批判孔老二儒家，一方面推崇法家管仲，大家学这方面的

历史，当初怎么儒法斗争。始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批孔，有人说是因为林彪在毛家湾的家里，挂了很多孔子的教条。传说周恩来是大儒，但是没有正式摆出来批，实际上原意要批周。就像第二次庐山会议，批陈伯达，当时也有感觉不只是批陈伯达，后来证实是批林彪了。

李：你们在北京不是应该有些小道消息？

管：小道消息后来还有，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一九七五年批水浒，那时我已经从干校回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把批水浒联系到哪一个国内的政治人物或事件。物理所也批水浒批得很厉害，我刚刚讲我到干校的领导，他对批水浒就很积极，这个人的好处是，水浒你批宋江怎么批也没关系，要是活人批就怕对不起人了，所以他对这很积极，对其他的反而不积极。批水浒最核心的一条是，原先认为说水浒是正面的东西，宋江是英雄，后来又说宋江是叛徒。小道消息就有人将说这是暗批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在重庆待过八年，更早时跟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就合作过，抗战胜利又到南京梅园，一直到国共全面内战才撤回来，所以这中间好像有问题，这个始终没有摆到台面上，只是下面传的小道消息。其中有一个小道消息是，周恩来临死以前，康大姐（编注：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去看他时，他说他不是叛徒，这是传出来的。他 also 知道批宋江可能是暗指他，只是没来得及事情爆发，他就死掉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去世震动很大，我认为从此是多事之秋了，就是事情会比较复杂。因为周恩来在的话，还可以顶住一片天，那时邓小平已经第二次被批下去了。就在一月八日前后，毛泽东发表了他最新的诗作，几首诗，那些事的含义大家不太理解。我的男孩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到一九七六年三岁左右，也能够背那些诗了。

◇ 胡耀邦、李昌

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科学院当时很乱，就派了胡耀邦到科学院，胡、李、王三个人。李是李昌，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念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没毕业就到延安了，后来在哈工大也当过校长，后来是团中央书记，跟胡耀邦在一起，有好几个书记，胡是总书记，文革初期时都被打下去。除了北京市政府，北大彭真这条线，首先被打下去的就是文艺界的头，然后就是团中央，团中央书记都一个个被押在团中央楼上示众。那时真是革命，一般人有问题顶多是抓到牢里，这个还游街戴高帽什么的。王是王光伟，主要是胡、李、王。在这段时间里，后来又调来两个人，一个是非常大的干部，刘华清。刘华清我还跟他打过交道，因为他是负责管后勤。这些人能解放出来就算已经不得了的事，本来都是走资派，都被打下去关在牢里。原来的中央委员里有两个人首先被解放，其中一个胡耀邦，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解放了，是毛主席点的名，先把这两个人解放出来。所以这些人，像你看到刘华清这么大的干部怎么到科学院管起后勤来了，当时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了，因为至少被解放，不是敌人了。胡耀邦跟李昌很活跃，经常跟我们联系，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就是邓小平出来的那一段，每天开座谈会，实际上是拨乱反正又把以前的东西（文革认为不正确的）统统都搬回来了。整个思想体系，这些人跟我们比较符合，所以我们那时也很吃香，一直到批邓以后，才又被打下去。胡耀邦是党组书记，不是院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他直接由司机载到物理所，事先没有通知，跑到二楼会议室，所有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来了，就马上通知革委会主任郭佩珊，立刻将所有党委委员叫到二楼会议室，那时我也是党委委员，跟胡耀邦一起座谈。结果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一句话就问郭佩珊，工资多少，而且每个人都问，问完以后就说“太低了”。他就说要怎样让科研人员条件更好，住的房子要改善，两地关系要解决。像我也有这个问题，郑宗爽是在郊区很远，只能每个礼拜见一次面，后来郭佩珊也帮忙，把她调到物理所来了，胡耀邦的意思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后来不是打下去了吗，他们跟着也统统被打下去，就把胡耀邦、李昌，由造反派揪到物理所在五楼会议室批斗，这是七六年批邓以后的事，还要让我们这些人参加揭发。我记得胡耀邦表现还是不错，因为胡耀邦并没有被宣布有罪，只说他有问题，造反派就可以把他揪过来斗。这时科学院出现小四人帮，以柳宗阳为首，之后四人帮被打垮，他们也被打下来了。那

时就是他发动的，物理所也有他下面的人，就是物理所的造反派，一直到我们室里也有造反派。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就是原来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叫钱永嘉，他那时整我也整得很厉害。在我们研究室里干部要站队时，我那时当然也说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第三类，自己不能认为自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毛主席说分四类，通常干部都说自己是第三类，那时干部只要能争取到第三类就已经不是敌人了，第四类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其中有一派是以钱永嘉为代表，我和他讨论过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想说明我不是走资派，他就是不同意，还认为我是敌人，当时不是只有他，是一派人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我学的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东西，而且我写的汇报提纲什么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另外一派是保我的，这一派的头头是赵忠贤，他们就批赵忠贤是远程大炮，光批刘少奇，你自己面对的修正主义分子你就不批。后来说要三结合，要解放一个干部出来，我们室里选来选去还是认为我比较好一点，上面规定说要实际考察，看行不行，另外要参加造反派的学习，当时我比较聪明的是，这两派都在争取，有的地方是两派各推荐一个老干部，为了让自己推荐的上，两派就互相批斗，所以很多地方都纠缠很久，因为造反派始终两派兜不在一起。我就采取一个策略，因为要解放，必须跟造反派学习革命理论，他们就组成一个帮助干部学习的会，我就参加反我的那一边，因此他们就比较不反对我，我参加这个的选择还是比较成功的。

当时批判胡、李，其中“五子登科”是他们的罪状，就是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说他搞大差距，要给研究人员提高薪水，就像苏联一样搞特权阶层。另外是镇压造反派，因为他来了造反派就靠边站，不受重用，其实那时造反派也还算是有点分量，没有真正被打下去，只是不像以往可以当头了。

李：除此以外，您对胡耀邦的印象怎样？

管：那个时间并不是很长，给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们直接接触。凡是经毛泽东一批就是不得了的事，当时科学院研究所的一个人，自己办了一份生物方面的通俗杂志，被毛主席看见了，认为办得很好，后来这个人就诉苦，说他办这个杂志有多困难，大家都不支持，就批他所里的人。那时胡耀邦是领导，所以胡耀邦也有问题，你们科学院的事怎么胡不知道，还直接捅到毛主席那里去，而且毛主席也支持，你们怎么不支持，所以胡耀邦那时也有点慌了手脚。就在会议上，把所里的领导大批了一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所里的郭佩珊他是革委会的主任，三结合时他站出来的，他的行为言谈举止，无形之中就受到造反派的影响，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讲，后来邓小平一出来，他就变成有错误的人，下面原来保守的人，在开会时就攻他，李昌还出席过一次，郭佩珊当时就有点不服，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没点名的批评了郭佩珊，而且还拍了桌子，郭佩珊本来就有心脏病，那次以后心脏病也发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胡耀邦在团中央被批下去时，有一份非常长的胡耀邦的检讨，是红卫兵的小报里头传的，这份材料我现在没有，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如果要是看到那份检讨，那对胡耀邦一定是全盘否定。他检讨批判了说邓小平怎么不好，邓小平搞阴谋，然后承认自己完全是为了往上爬，所以巴结邓小平，反正就是百分之百完全否定自己的一个检讨。当然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被迫要斗私批修，他这个是相当彻底了，别人一看，这个人根本是大坏蛋。这个材料西方好像也没有人听说过，但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胡耀邦在那个地方发火了，我当时也感觉到他太容易冲动了，后来他下台跟这个太容易冲动也有关系，批邓后又反过去他们又被打下去，郭佩珊又神气了一番。第二次胡耀邦就没有来了，邓小平打下去了以后，后来四人帮打倒，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一下子就变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没有到科学院，但是李昌来了，郭佩珊又有了问题。我们所里头，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紧张得很，原本是中间斗来斗去，弄得互相仇恨，原来八个党委委员，有两个自杀。按常理来说现在我比他们权大得多，后来我当所长，我并没有收拾造过我的反的造反派，而且后来派人出国访问我还把他们放在前面，差不多是第一批能到国外去深造的，我理解这些人是上了毛泽东的当，自己认为很革命，当然一方面他们也是有私心想夺权，但是归根究底都是毛泽东搞的，如果继续报复下去，那不是永远没完没了，文革期间就是这样。

文革十年甚至十年以前，一直没调过薪，大概有二十年左右，忽然在邓小平主政时要调薪了（那时的调薪还不是后来李昌想搞的，主要优待研究人员，当然李昌的思想是对的），但是下面反对得不得了。那时调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那要哪些人可以调呢？就要群众讨论，三板定案，要经过三次的讨论。这时就相持不下，因为平常如果每年都调的话，今年百分之四十没轮到，明年可能会轮到我。现在就不同，这次是突然上面来的命令，也许得过二十年才能再调，所以大家就拼命要往里头挤，因此复杂得很，群众斗群众。有一个笑话，物理所有一个研究组讨论到最后压缩成五人，还是多一个，要从最后的两个人里挤下去一个，这两个人僵持不下。后来其中有一人要上厕所，结果就决定把他去掉，因为他在场的話，不好意思这样做。所以就有笑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如厕。这是在七六年，四人帮还没打倒时。

#### ◇ 四五事件

以上讲的都是文革期间的事，在文革期间我还有七二年七三年到国外去访问，七三年以后七四年又去了干校，七五、七六经过批邓，中间有不少反复。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去世，紧接着华国锋代理总理，就开始批邓了。批邓在科学院，就开始又紧张起来，本来胡耀邦来了，邓小平复出，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解放了，但是忽然有一天要所有的人到礼堂集合，说邓小平有问题要复辟，要批邓，我也不记得说他是什么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事情不妙了。这以后不久，邓小平还出面接待美国总统，在机场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神色很凝重，因为内部已经开始批他了。一开始还是胡耀邦他们传达，后来因为胡耀邦是邓小平路线，实际上胡耀邦好像是毛泽东点名要解放的，安排到科学院是邓小平的安排。总理去世以后，那段时间开始批邓，毛泽东的威信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人民心目中实际上对邓小平很欣赏，就以纪念周总理去世为名，发生了“四五事件”。“四五事件”在北京，总理送葬时规模很大，那次就有点像“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胡耀邦一样，说是纪念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更多的是反对批邓。“四五事件”整个有一个诗集，收集群众自创的悼念的诗文，影射四人帮，很多诗把他们的名字串在里头。

李：“四五事件”有死人吗？

管：有二十几个人被抓起来，用木棍打，没有听说死人，所以“天安门事件”被认为是邓小平大的败笔，就是“四五事件”是四人帮的，当然是用华国锋出的名，实际上是四人帮挟持了华国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在四五事件前后听到很多传闻，有点像天安门事件一样，就是传闻很多。内部传达是说他们是反革命，甚至说他们的后台是邓小平，四人帮是这样讲，那时四人帮还在台面上，很嚣张。在四五事件以后，等于又把反对王张江姚的人镇压下去，可是人心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了。在事件过去后的五六月份，我们在长沙开一个会，是超导的学术会议，科学院主办，由我主持，把全国研究超导的人集中起来开会。科学院派了一个新技术局局长造反派邓述慧（女性），是科大数学系毕业的，本来是年轻的科大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到科学院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因为造反变成新技术局局长，这个人倒是相当不错，她没有乱整人，而且她整个思想体系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她没有一些劣行，所以后来就一直上去了。她算是头头，我是主持学术方面，我们还合作的蛮好。最后她提出说我们去访问杨开慧的故居，离长沙大概几十华里，我们只能保密行动，因为实际上是表达对江青的反感，所以不能够传出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租一辆车，只找少数比较可靠的人一起到杨的纪念馆，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还不能否定。就在这时间朱德去世了（可能是五月份）（编注：朱德，1886—1976，逝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当时我们也只能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江青的不满。

不久以后，发生唐山大地震，夜间我们全家从三楼宿舍跑出来，接着有两个月的时间，不敢回到家里，就住在物理所院子里搭的帐篷，北京倒是没有死人，只是有些老旧的建筑倒塌，当时我是物理所革委会的成员，我要负责到城里看我们的同仁有没有事。就在那期间，忽然宣

布毛主席去世了（编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事先没有任何警觉，柳宗阳来宣布。开始学习毛主席一生伟大事迹，大概一个月以后（编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才开始把四人帮揪出来。事先也没有想到，因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好像都是毛主席文革的领导。

李：当时知识分子对周恩来、毛泽东两人相继过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管：知识分子当时都是处在无权的地位，不敢有什么表示。当时我们所上一些老科学家，几乎是处在社会阶层最低的地方，文革期间被罚扫厕所、罚站、住牛棚，所以他们好像都是处于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地位。我自己在任何一个时刻，我还是比较乐观、自以为是的态度。而且在有一段时期，刘邓发动群众批评领导，我也是站在群众那一面，当然我没有造反行动，但是在思想感情上认同。虽然我不主张把这些人关牛棚惩罚，但领导有不少不好的地方，群众提意见写大字报，应当有这个权利。但是后来搞成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敌我矛盾，这是我就不能接受了。文革当中，造反派也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我检讨承认有私心，现在我也不会否定，也会承认那个检讨是对的，因为当时我是诚恳地检讨，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逼不得已，我自己觉得任何时候不能说违心的话。我看到胡耀邦的检讨就是这样，后来他又作了检讨，在天安门事件以前胡耀邦刚下台，又作了一次检讨，在那次检讨就骂方励之这些人是坏人，因为包括赵紫阳都说我们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到后来学生慢慢起来，胡耀邦又说他们的检讨不对了，错怪了一些人，总之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我为什么对陈云印象比较好，就是虽然大家都说陈云是左的，但是他的人品很好，一方面在东北解放战争，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来了，我们亲自听他报告，把危机在他的领导下解决了，把局面打开。后来像国内发生很多经济问题，大跃进饿死很多人，他又出来管经济，两三年就恢复了。当然他是计划经济，苏联的那一套，但是他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什么异想天开的大炼钢铁，乱搞的，他把这些都收拾起来了。他没有做过假的检讨，他就算靠边站坐冷板凳，他也无所谓，因为不做检讨就不能再出来。由此种种来看，陈云这个人实在是不错。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都派人到外面去出差调查每个干部的历史，也包括我，要清算我整个历史，实际上是拿公家的钱去旅游，要自己交待一切，还派人一一去了解核对，验证你写的书面材料，是不是有假。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实际有人就借这个机会去公费旅游，另外也是想从这里尽量找出你的毛病来，所以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有的证人不老实，说的加油添醋就糟糕了，本来他们就希望你是第四类的走资派，再加上调查出现有些地方有问题。当时张劲夫已经被总理点名说他是走资派，要打下去的，从这一点看周总理也是有问题。张劲夫是新四军后勤部部长，抗战时跟方毅在一起，所以当时造反派就去方毅那调查张劲夫，调查多半是证实他当时没有问题，但是方毅不但证明他没问题，还讲了很多他当时的功劳、优点，我当时就觉得方毅这个人不错，他那时还没打下去，是商业部部长，已经揪他揪得很厉害，但是还没完全下来，定为走资派，他实际上也是没有权了，可是人家去向他调查时，他还是讲了很多好话，他们确实也是老战友了。有的人就不实事求是，反而添油加醋，他确实就是想把这个保下来。

## ◇ 文革之后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还没公布的头一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科学院有一个人消息灵通到我家来告诉我的，我们所里的造反派也不知道。那时华国锋是主持的，但是内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因为华国锋后来也被打下去了，所以在我看对他有点不公正，至少这是在他主持情况之下打倒到四人帮的，当时他当然也有不正确的地方，譬如，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些社论这样讲法后来有点阻碍邓小平复出，不过虽然邓小平被批下去了，群众还是希望要把他给请出来。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小平才复出，这是不是他在阻挠我们不知道。但是揪四人帮就是大事，如果四人帮还在上头，那不得了的事，而且四人帮当道时华国锋好像是被架空，毛泽东临去世前，华国锋还见不到毛主席，是毛远新在中间传达。华国锋也不是毛泽东嫡

系的人马，他是科班从地委书记一步步上来的。他当副总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时，就是科学院胡、李、王那时候，他还到科学院开过一次会，约见了六个人。还没有批邓，但是已相当紧张，四人帮跟邓小平都在上头，所以他比较谨慎，但是会议上的人都说是科学院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搞法，他好像都还听进去了，他当然没有表态，因为他很慎重。我跟华国锋一共握了十四次手，因为那时好像各式各样的会比较多，他可能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瞎统计的。后来又有人说打倒四人帮是叶剑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老帅军权在握，但是华国锋当时毕竟是第一把手，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做。所以把四人帮捉起来和邓小平复出，是两回事，但四人帮如果没有下来，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因为批邓嘛！所以捉四人帮这件事，他应该有一份功劳。后来大家批他，仍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泽东那时的口号，华曾主持开了一个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个我没去。又有一个工业学大庆会议，前半段在北京开，后半段在大庆，我参加了这个会。前半段是学文件，后半段在东北，开会期间，很多部长都去了，强调大庆这个油田是在地下的，地上是变成农场、牧场这类地方，工业跟农业结合。最重要的，当时提出来很多指标，相当振奋人心，当时我回到北京还在物理所传达过纪录，大家都很鼓舞。

□ 摘自《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李雅明主编 何淑铃整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